

批判文汇报的参考資料

(一)



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研究部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 合編

1957.9

目 录

✓ 文匯報在一个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	人民日報編輯部…	1
✓ 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应当批判……	人民日報社論…	4
對新聞工作者的一个教訓……	人民日報社論…	9
从文匯報的錯誤中吸取教訓……	解放日報社論…	12
* * *		
明确方向 繼續前進……	文匯報社論…	17
歡迎督促和幫助……	文匯報社論…	19
向人民請罪……	文匯報社論…	21
痛切改造自己……	文匯報社論…	25
“左叶事件”的沉痛教訓……	文匯報社論…	28
我們的初步檢查（上）……	文匯報編輯部…	30
我們的初步檢查（下）……	文匯報編輯部…	38
我的反黨罪行……	徐鑄成…	47

(AD 35/12)

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

人民日報編輯部

下面轉載的這篇文章見于6月10日文匯報，題為“錄以備考”。上海文匯報和北京光明日報在過去一個時間內，登了大量的好報道和好文章。但是，這兩個報紙的基本政治方向，卻在一個短時期內，變成了資產階級報紙的方向。這兩個報紙在一個時間內利用“百家爭鳴”這個口號和共產黨的整風運動，發表了大量表現資產階級觀點而並不準備批判的文章和帶煽動性的報道，這是有報可查的。這兩個報紙的一部分人對於報紙的觀點犯了一個大錯誤。他們混淆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報紙的原則區別。在這一點上，其他有些報紙的一些編輯和記者也有這種情形，一些大學的一些新聞系教師也有這種情形，不只文匯、光明兩報如此，不過這兩報特別顯得突出罷了。錯誤觀點是可以經過研究、考慮和批判加以改變的，我們對他們期待着。從最近幾天這兩個報紙的情況看來，方針似乎已有所改變。黨外報紙當然不應當辦得和黨報一模一樣，應有它們自己的特色。但是，它們的基本方向，應當是和其它報紙一致的。這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國家，報紙是社會主義經濟即在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通過新聞手段的反映，和資本主義國家報紙是無政府狀態的和集團競爭的經濟通過新聞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階級區分的時期，報紙又總是階級斗

爭的工具。我們希望在這個問題上展開辯論，以求大家在這個問題上取得一致的認識。新聞記者中，有一部分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也有資產階級新聞觀點，也應當考慮、研究、批評這個錯誤觀點。教條主義的新聞觀點和八股文風，也是應當批判的。這一方面的東西是很討厭的。黨報，包括本報在內，在這一方面犯有錯誤。這一方面的錯誤，在辯論中也必須展開批判。這樣一來，在新聞問題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兩條戰綫上的鬥爭。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看到了文匯報的一些人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向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轉載于此。並且借这个由頭，向我們的同業——文匯報和光明日報說出我們的觀點，以供考慮。

錄 以 備 考

——讀 報 偶 感

姚 文 元

同是一條消息，經過不同的編輯同志的編排，其價值竟可以相差十萬八千里之遙，這個奇妙的秘訣，是我最近從報紙上得來的。

前幾天毛主席在接見共青團代表時發表了講話。講話雖短，含意却極深長。解放日報用特別巨大的鉛字和醒目的標題放在第一條新聞，人民日報排在當中，標題比解放日報要小些，也突出了“團結起來，堅決地勇敢地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都是錯誤的。”但文匯報呢，卻縮小到簡直使粗枝大葉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

了也覺得這是一條無足輕重的新聞。其全部地位，大約只有解放日報標題用的鉛字二個鉛字那麼大。

到底是什麼緣故使三個報紙編輯部對一條新聞的估價相差如此之遠呢？是因為解放日報認為這條消息特別重要呢，還是因為文匯報編者同志覺得這個談話是談談什麼社會主義、黨的領導……之類早已“聽得爛熟”的老話，沒有什麼新鮮內容，所以無足輕重呢？還是因為編者以為文匯報的讀者是知識分子、同青年們沒有什麼關係？抑還是編者以為突出這條消息，會影響“爭鳴”，因為“爭鳴”中似乎是不適合多說什麼黨的領導、社會主義的，我因為說了兩句，就很遭到有些人的反對。……

我不想判別是非，也許各有各的道理，“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吧，——因為不同的編報方法也是“爭鳴”之一種，毛主席就說過，報紙這樣辦、那樣辦就是兩家。我也不想去分析其中的優劣，因為現在也還是各人顧各人的方法去辦，例如對李維漢的談話，人民日報是突出了“社會主義是長期共存的政治基礎”作為標題，並且用“……總的說來，從各方面提出的批評和意見，有很多是正確的，應該認真地加以接受和處理；有相當一部分是錯誤的，還須要進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作為副標題，而文匯報則以“中共誠懇歡迎監督和幫助”為標題，以“認為很多批評和意見有助於克服三大主義進一步加強和鞏固共產黨的核心領導作用”為副標題，明眼人一見就可看出彼此着眼點是不同的。但我以為，這種不同是比“千篇一律”好得多的一種好現象。我更不想去追究各人着眼點不同的心理狀態，因為我並無“未卜先知”之才。所以關於是非、優劣、原因，都待進一步加以考證。

有人要問：你自己就沒有見解了嗎？答曰：有的。但不想

說。不想說的理由呢，答曰：也不想說。這並非如唐弢同志所說的“欲說還休”，而有另一種原因。然而這至少駁倒了一種理論：“新聞的編排是沒有政治性”。編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

我是很歡喜看文匯報的，因為它新鮮、有內容、報道面廣。這回確很抱歉，涉及了文匯報。好在文章中並無一個“主義”也沒有一頂帽子，也沒有“判決”是非，大概不會被人目為“棍子”。如果能引起讀報人及編報人一點點思索，我的願望就達到了。末了，希望這篇涉及文匯報的短文能在文匯報的副刊上登出。

6月6日

（原載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報）

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

人民日報社論

自本報編輯部6月14日發表“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以來，文匯報、光明日報對於這個問題均有所檢討。

光明日報工作人員開了几次會議，嚴肅地批判了社長章伯鈞、總編輯儲安平的方向錯誤，這種批判態度明朗，立場根本轉過來了，由章伯鈞、儲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路線轉到了革命的社會主義的路線。由此恢復了讀者的信任，像一張社會主義的報紙了。略嫌不足的是編排技巧方面。

編排的技巧性和編排的政治性是兩回事，就光明日報說來，前者不足，后者有余。技巧性問題是完全可以改的。在編排技巧方面改一改，面目一新，讀者是會高興的。這件事也難，本報有志于此久矣，略有進展，尚末盡如人意。

文匯報寫了檢討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寫了許多反映正面路線的新聞和文章，這些當然是好的。但是還覺不足。好像唱戲一樣，有些演員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像，裝腔作勢，不大自然。這也很難。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的余地。編輯和記者中有許多人原在舊軌道上生活慣了的，一下子改變，大不容易。大勢所趨，不改也得改，是勉強的，不愉快的。說是輕鬆愉快，這句話具有人們常有的禮貌性質。這是人之常情，應予原諒。嚴重的是文匯報編輯部，這個編輯部是該報開資產階級方向期間掛帥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脫。帥上有帥，攻之者說有，辯之者說無；並且指名道姓，說是章羅同盟中的羅隆基。兩帥之間還有一帥，就是文匯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將。人們說：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就是文匯報的這樣一個民盟右派系統。

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還有農工民主黨，一模一樣。這兩個黨在這次驚濤駭浪中特別突出。風浪就是章羅同盟造起來的。別的黨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惡劣。但人數較少，系統性不明顯。就民盟、農工的成員說來，不是全體，也不是多數。呼風喚雨，推濤作浪，或策劃於密室，或点火於基層，上下串連，八方呼應，以天下大亂、取而代之、逐步實行、終成大業為時局估計

和最終目的者，到底只有較少人數，就是所謂資產階級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數被蒙蔽，少數是右翼骨干。因為他們是右翼骨干，人數雖少，神通卻是相當大的。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于章羅同盟。

新聞記者協會開了兩次會，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時間不過一個多月，反映了中國時局變化之速。會是開得好的，第一次黑雲壓城城欲摧，擺出了反動的資產階級新聞路綫。近日開的第二次會，空氣變了，右派仍然頑抗，多數人算是有了正確方向。

文匯報在6月14日作了自我批評，承認自己犯了一些錯誤。作自我批評是好的，我們表示歡迎。但是我們認為文匯報的批評是不夠的。這個不夠，帶着根本性質。就是說文匯報根本上沒有作自我批評。相反，它在14日社論中替自己的錯誤作了辯護。“我們片面地錯誤地理解了黨的鳴放政策，以為只要無條件地鼓勵鳴放，就是幫助黨進行整風；多登正面的意見或者對錯誤的意見進行反批評，就會影響鳴放”。是這樣的嗎？不是的。文匯報在春季里執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方針，向無產階級舉行了猖狂的進攻，和共產黨的方針背道而馳。其方針是整垮共產黨，造成天下大亂，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幫助整風”嗎？假的，真正是一場欺騙。在一個期間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錯誤意見不作反批評，是錯了嗎？本報及一切黨報，在5月8日至6月7日這個期間，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這樣做的。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丑類。就是說，共產黨看出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一場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讓

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動這一場戰爭，報紙在一個期間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資產階級反動右派的猖狂進攻不予回擊，一切整風的機關學校的黨組織，對於這種猖狂進攻在一個時期內也一概不予回擊，使群眾看得清清楚楚，什麼人的批評是善意的，什麼人的所謂批評是惡意的，從而聚集力量，等待時機成熟，實行反擊。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歼滅它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于鋤掉。農民不是每年要鋤幾次草嗎？草鋤過來還可作肥料。階級敵人是一定要尋找機會表現他們自己的。他們對於亡國、共產是不甘心的。不管共產黨怎樣事先警告，把根本戰略方針公開告訴自己的敵人，敵人還要進攻的。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就是說，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勢利導，奪取勝利。反動的階級敵人為什麼自投羅網呢？他們是反動的社会集團，利令智昏，把無產階級的絕對優勢，看成了絕對劣勢。到處点火可以煽動工农，學生的大字報便于接管學校，大鳴大放，一觸即發，天下頃刻大亂，共產黨馬上完蛋，這就是6月6日章伯鈞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勢的估計。這不是利令智昏嗎？“利”者，奪取權力也。他們的報紙不少，其中一個叫文匯報。文匯報是按照上述反動方針行事的，它在6月14日却向人民進行欺騙，好像它是從善意出發的。文匯報說：“而所以發生這些錯誤認識，是因為我們頭腦中還殘存着的資產階級辦報思想”。錯了，應改為“充滿着”。替反動派做了幾個月向無產階級猖狂進攻的喉舌，報紙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資產階級的方向，殘存着一點資產階級思想，够用嗎？這裡是一種什麼邏輯呢？個別

性的前提得到了一个普遍性的結論，这就是文匯報的邏輯。文匯報至今不准备批判自己大量报导过的違反事实的反动新聞，大量刊發的反动言論，大量采用过的当作向無产階級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編排。新民報不同，它已經作了許多比較認真的自我批判。新民報犯的錯誤比文匯報小，它一發現自己犯了錯誤，就認真更正，表示了這張報紙的負責人和記者們对于人民事業的責任心，这个報紙在讀者面前就开始有了主动。文匯報的責任心跑到那里去了呢？你們几时开始，照新民報那样做呢？欠債是要还的，文匯報何时开始还这笔債呢？看来新民報的自我批判給文匯報出了一大堆難題，讀者要問文匯報那一天赶上新民報呢？文匯報現在处在完全被动的地位。在新民報沒有作自我批判以前，文匯報似乎还可以混过一些日子，有了新民報的自我批判，文匯報的日子就难过了。被动是可以轉化为主动的，那就是以新民報为师，認真地照它那样办。

現在又回到“資產階級右派”这个名称。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前面說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資產階級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說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識分子、資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風浪中表現出来了。他們人数極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別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輕視。这种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动，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适用。他們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办罪呢？現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們中許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寬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改，繼續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化消極因素为積極因素，这些原則，对他們还是适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論，無行动。言論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無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寬大些了。錯誤的言論一定要批判干淨，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許有言論自由。一个偉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們的錯誤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們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們有毒；并且散發出来害过人民。

共产党繼續整風，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風。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風就可以順利进行了。

（1957年7月1日）

对新聞工作者的一个教訓

人民日报社論

在今年5月間北京和上海报纸上喧嚷一时的所謂“左叶事件”，經過新聞工作者协会最近的調查、对証，真相已經大白。右派分子向我們的党和国家猖狂进攻的时候，巧妙地利用这个事件，从新聞战綫上放出一支毒箭。許多报纸，包括本报在內，沒有查明事实，輕率地、錯誤地發表了一些关于这件事情的消息和文章，在客觀上起了替右派分子推波助瀾的作用。

其实，这件事情本身沒有任何重要的意义。这只是一个国家工作人員同几个新聞記者發生的一次小糾紛。当时农業展覽

館中人群拥挤，秩序混乱，在場的新聞記者是有責任的。負責維持秩序的農業部部長助理左叶處理問題簡單，不冷靜，對新聞記者表現了非同志的態度，也是不對的。但是，事情不過如此而已。這有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呢？

然而，這件事情居然鬧起來了。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們有個別新聞工作者情緒偏激；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為新聞界的右派分子惡毒地抓住這件事情，盡力把它誇張、渲染，並且歪曲某些重要的情節，煽起了反動的火焰。

當時的上海文匯報，在這件事情上表現的最凶狠、最惡毒。它在5月8日的社論中，煽動人們說，“八年以來，新聞記者們所遇見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是特別多的”；“卑視新聞記者在我們國家是有傳統的，遺憾的是這個衣鉢竟傳到如今”。它甚至还說：“當一個政權反人民的時候，它是排斥記者、懷疑記者的”。按照它的邏輯來推論，現在的新聞記者正受着“排斥”，而排斥記者的政權就是“反人民”的政權，那末，對於這樣的政權不打倒還等什麼呢？這樣，文匯報就完全撕下了面具，張牙舞爪地向黨和國家撲過來了。

在文匯報的煽動之下，許多站在資產階級立場的編輯和記者們都出場了。有的瞪起眼睛說現在是“不敢講話的時代”；有的蹲在旁邊敲邊鼓，說，你的看法是對的，所以報紙的任務應該是“揭露、揭露、再揭露”……種種謬論不一而足。特別是在5月中、下旬的北京新聞工作座談會上，資產階級新聞觀點就更集中地暴露出來了。

右派分子為什麼這樣熱心於煽動新聞記者，並且企圖通過他們篡奪某些報紙呢？理由很簡單：右派分子是搞政治陰謀的老手，他們很知道報紙是階級鬥爭的重要工具。報紙掌握在人

民手里，乃是集体的宣傳者、鼓动者和組織者，可以教育人民，打击敌人，交流經驗，指导工作。如果報紙掌握在右派分子手里，就要变成牛魔王的假芭蕉扇——引風煽火的武器。在章、罗联盟操縱之下，文匯、光明兩报，不过一个多月的時間，就曾把毒火点遍全国各大城市；如果他們篡夺了更多的報紙，試想那会鬧成什么样子！

为什么右派分子对于这个“事件”的歪曲报道竟有如此广闊的市場，許多報紙都在这个問題上犯了程度不同的錯誤呢？这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严重警惕。原因是我們人民的新聞工作队伍还存在着严重的思想不純和組織不純的現象。第一，在我們的队伍中还有相当濃厚的資產階級新聞观点，这就使右派分子容易在新聞界点火；第二，在我們的队伍中也还有一批右派分子，他們同报社外面的右派里应外合，使右派对于新聞界的进攻一时显得特別猖狂。

有些人要求絕对的“新聞自由”。但是，究竟什么是所謂絕对的“新聞自由”呢？有了資產階級的、資本主义的新聞自由，就沒有無产階級的、社会主义的新聞自由。文匯报和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期被右派分子用資產階級方向压倒了無产階級方向，是一个教訓；“左叶事件”的不真实报道压倒了事实真相的發表自由，也是一个教訓。文匯报記者右派分子刘光华所說的“登出来大家都知道了，收不回来了”，虽然狂妄，却說明了兩種自由互相排斥的事实。中国青年报發表关于“左叶事件”的文章以前，曾請农業部就原稿核对事实；农業部建議查清事实然后發表，中国青年报沒有理会，因而犯了錯誤。本报發表袁水拍的諷刺詩“官僚架子滾开”、梁汝怀的杂文“要学会尊重人”和方成的漫画的时候，沒有認真查对事实，也造成一大錯誤。右

派分子对社会主义新闻学的攻击，主要目标之一正是它的真实性。很显然，我們如果严格遵守新闻必须真实的根本原则，坚持真实新闻的新闻自由，就能避免这次的错误。

目前全国新闻界正在积极投入反右派的斗争：不但用新闻这个工具来反对右派，而且在新聞界内部揭露右派分子和批判右倾思想。“左叶事件”是右派进攻全国新闻界所使用的武器之一。所有的新闻工作单位都应该从这一事件中取得教训，联系在反右派斗争中的其他错误和缺点，检查自己的工作，努力保证我国人民的新闻事业在社会主义轨道上前进。

（1957年8月14日）

从文汇报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解放日报社论

前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对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继续作了严正而又深刻的批判。社论指出：文汇报大量地报道了违反事实的反动新闻，大量地刊登了反动的言论，大量采用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社论中指出：文汇报“……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我们完全拥护这个批评。人民日报对文汇报的批评，不仅在帮助文汇报把立场根本转变过来方面将会起巨大的作用，就是对于我们所有的报人，应该如何办好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如何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运用阶级观点来认识当前的反右派斗争，都同样具有重

大的意义。

我們从文匯報編輯部工作人員連日举行大会所揭發的初步材料看来，章伯鈞、罗隆基串通一气，指揮文匯報向工人階級猖狂进攻的事实，已經是昭然若揭了。

文匯報自从1938年創刊以来就一直在党的关怀与帮助下成長起来的，可是文匯報竟然忘了恩，負了义了。罗隆基不要文匯報听党組織的話，要文匯報听他的話，文匯報就百依百順，言听計从，十分服貼，任他摆布。罗隆基要組織什么右派大人物写稿子，文匯報就去組織，罗隆基要刊登这个，文匯報就不敢刊登那个，罗隆基要刊登那个，文匯報就不敢刊登这个。章伯鈞、罗隆基联盟实际上是文匯報的“中央”，文匯報所需要經常了解的“政治气候”，不是什么別的，而是章伯鈞、罗隆基等右派头目的政治野心。文匯報不願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則、人民的利益、党的政策办事了，而要根据章伯鈞、罗隆基的意圖办事了，文匯報热心于宣傳章伯鈞、罗隆基的政治方針，难道这还不显而易见嗎？如果不信，請听徐鑄成自己說的話。徐鑄成說：“我真正依靠的是民盟的組織。”所謂民盟的組織是什么呢？不正是罗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的系統嗎？徐鑄成的弦外之音，不正是要文匯報摆脱党的領導，反对党的領導嗎？徐鑄成的“拆牆經驗”，不正是他秉承罗隆基的旨意用实际行动来排挤黨員，夺取党的領導权的經驗嗎？为什么他要把黨員从文匯報排挤掉呢？原因無他，因为文匯報里有了黨員，就不免有点碍手碍脚，不能痛痛快快地把他們把報紙引上右派的道路。

文匯報既然不要党的領導，反对党的領導，既然要死心踏地的依靠民盟右派的系統，自然，犯严重的錯誤就是注定了

的。不管有人在宣傳什麼報紙沒有階級性，不管有人在宣傳什麼報紙的商品性，文匯報在最近幾箇月中成為資產階級右派的喉舌，這一活生生的事實就完全證明這種說法的徹底破產。報紙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政治性的，都是政治鬥爭的工具，報紙不是工人階級的宣傳工具，就一定是資產階級的宣傳工具。中國的報紙可以有幾百家，幾千家，實際上只有兩家，一家屬於工人階級，一家屬於資產階級。沒有階級性的報紙、沒有立場的報紙，在人類社會里是找不到的，也許在“蟲類”社會里可以找到，那我們就不知道了。可是階級性不僅僅對人類起着作用，就是“蟲類”似乎也逃不出它的影響。徐鑄成不是反對做人民日報的“應聲蟲”嗎？然而，他為什麼那麼俯首貼耳的甘願充當章伯鈞、羅隆基的“應聲蟲”呢？難道這裡只有商品關係，買賣關係，而不是政治關係，階級關係嗎？

由此可見，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不是從天而降，而是文匯報離開了黨的領導，脫離了黨的影響，依靠了資產階級右派的結果。文匯報實際上有一個太上總編輯，有一個章伯鈞、羅隆基的右派聯盟指揮着文匯報的筆政，於是文匯報就成了資產階級政治鬥爭的工具，走上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道路。

所以，從文匯報所犯的嚴重錯誤中要吸取的第一個教訓，就是要牢牢地記住，報紙在任何時候都不是超階級的，報紙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沒有立場。報紙一旦離開黨的領導，就一定要被資產階級所領導。什麼“同人報”，什麼辦報講立場、講觀點就是“教條主義”，什麼只要“一點論”，不要“兩點論”，如果以這些錯誤的思想來辦報紙的話，報紙統統都會走上邪路的。

如今，文匯報編輯部已經開始揭發和批判文匯報和右派的

种种关系了，这是可喜的事情，我們期待着他們做出更多的成績來。不過，還可以再進一步看看，章、羅右派聯盟之所以能夠在一個時期里篡奪了文匯報，文匯報之所以在一個時期里忠實地執行了章、羅的反人民的政治方針，能不能說，僅僅是被利用呢？如果這樣看，就是把問題的嚴重性簡單化了。如果僅僅是被利用而沒有其他的緣故，那末，章、羅的政治方針就會早被識破了，早就會引起編輯部的抵抗了。可是沒有，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於章、羅聯盟的主張，在文匯報編輯部也不是完全沒有市場的，也不是沒有共鳴的人的。不管是什麼貨色，不拿到市場上去，總歸是賣不出去的。當然，文匯報編輯部也有一部分同志，是與文匯報內右派作過鬥爭的，但是鬥爭也還不力，也沒有取得勝利，正確的意見沒有占領市場，因而就還有另一部分市場存在。這個市場之所以能夠存在，其原因是由於文匯報編輯部某些同志頭腦里仍舊殘留着資本主義的思想意識，因而有時就在某些問題上與羅隆基、浦熙修、徐鑄成的觀點發生共鳴。或者被章伯鈞、羅隆基表面上擁護共產黨，實際上反對共產黨的偽裝所迷惑，不認為他們俘虜文匯報幹反社會主義勾當的可恥，反而認為這些人是什麼“飽學之士”，是什麼“正人君子”。於是乎就不容易識別他們的陰謀花樣，在開展反右派鬥爭時就容易產生無原則、無立場的同情和原諒。自然，這些都是一般人容易犯的思想問題，不是右派問題。正如有許多愛國的知識分子，也曾經在文匯報上發表過一些帶有資產階級思想的文章一樣，或者是由於一時的思想動搖，或者是一時在某些觀點上與右派的觀點相合。這都是一般的思想上的毛病和缺點，與右派的有綱領、有理論、有行動、一貫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章、羅聯盟是完全不同的。